

第二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h.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h.com

一、火热的军校生活

我于1924年5月5日正式入学编队。第一期学生共四百七十名，合组学生总队，邓演达为总队长，下面分编第一、二、三、四队，统为步兵科。其中第四队是由备取生编成的。至9月，又将四川省续送的二十名学生和军政部讲武堂拨来的一百五十余名学生，合组为第六队（第五队是第二期学生队号）。当时王尔琢分在第一队，我和黄鳌、贺声洋都在第二队，后来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周士第将军及原国民党将领黄维、李奇中将军等也都在第二队。

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约四十华里处的黄埔长州岛，故简称黄埔军校。黄埔岛四面环水，又地处长州要塞，为广州军事重地，中山先生特地选中这个地方作为校址。

孙中山先生欲建立一个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机构的愿望由来已久。他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却屡起屡败，特别是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祸患生于肘腋”，更使中山先生受到极大触动。惨痛的失败教训使他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作为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保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给予中山先生以极大启示，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俄代表越飞，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

陈独秀、林伯渠等人的热情帮助下，中山先生毅然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又在苏俄和中共党人的积极协助下，加紧筹建黄埔军校。因此，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后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

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寄予了极大期望，他亲任军校总理，并委任蒋介石先生为校长，廖仲恺先生为党代表，此外，当时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要人都在军校各部门中担任重要职务。如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初为戴季陶、邵元冲）；李济深、邓演达分任训练部主任、副主任（邓氏负实际责任）；王柏龄、叶剑英分任教授部主任、副主任；林振雄任管理部主任；周俊彦任军需部主任；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政治教官以共产党员为主，主要有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兼政治部秘书）、高语罕、张秋人、于树德等。还有苏俄政府派来的鲍罗廷、加伦、巴甫洛夫、切列潘诺夫等富有军事和政治经验的专家指导军校的建设。

黄埔军校自创建之初，就洋溢着生气蓬勃的革命气氛，我们一入军校大门，便望见大门上方装嵌着“革命者来”的匾额，门两侧写有“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校内还张贴着许多诸如“拥护三大政策”、“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等标语、对联，师生们高唱“国民革命歌”和“黄埔校歌”，精神焕发，充满了革命激情。

从5月初入学到6月中旬，军校主要是进行基本的纪

律教育和军事训练。初时军校的经费十分困难，由党代表廖仲恺先生临时设法筹集，并无固定来源。因此我们的生活非常清苦，终日是粗蔬淡饭，住宿房舍亦很简陋。尤其是校内没有浴池，每人仅发一套衬衣裤，同学们在广东地区夏季特有的炎热、潮湿气候中操练，终日汗流浹背，身上的衣服湿了又捂干，干了又湿，人人身上都散发着难闻的汗馊味，非常不舒服。但大家都为投奔革命而来，没有人计较这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神状态。倒是那种极端紧张、严格的军事生活，使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开始很不容易适应。每日天不亮，起床号就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一跃而起，飞快地穿衣、叠被、洗脸、上厕所，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一刻钟之内完成。由于厕所与宿舍相距较远，我们必须来回跑步才能赶得上时间。然后是一刻钟的开早饭时间，饭后便出操训练或上课。每天的空闲时间很少，大家总是感到时间紧张、不够用。平时教员和各队队长不仅对学生的训练、听课等项要求极为严格，就是内务方面也毫不马虎。例如早晨起床，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军毯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中间，然后将本子、笔、墨水等学习用具整整齐齐地放在毯子边上。晚上睡觉时，也要按要求将衣服脱下放在一定位置，以便夜间突遇紧急情况时，不点灯也能将衣服迅速穿好，不耽误集合时间。这些看来都是些极小的事情，但要一下子做好也是不容易的。记得刚入学不久，我就出过一次笑话，某日晨，我于睡梦中被起床号声惊醒，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叠毯子。可那条毯子怎么也不能叠成上级要求的样式，我在

慌乱中，不小心将整瓶墨水都碰翻在毯子上，溅了一床，后来只好报请上级又重新发了一套铺盖。不过，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我们终于还是适应、并深深喜爱上了这种严肃、紧张的军校生活。

前面说过，我是顶用黄鳌的名字通过军校招生考试的，故入学后我一直未敢道出真情，岂知我和黄鳌同学又恰巧同在一队，每日出操点名，往往是俩个人同时应声而答，众皆诧异好笑。这件事对我压力很大，亦感到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某日终于鼓起勇气向区队长报告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并表示为了投身革命，这样做实出无奈，若军校认为不符合正常手续，我宁愿重新补考入学，区队长先还表情严肃地听我诉说事情原委，后来撑不住笑了起来，他要我先安心参加学习、训练，听候上级处理。上级似乎也很理解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心情，后来并未追究这件事情，只是把我的名字更改过来也就算了，这样总算搬掉了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大约在六月初，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来校作了一次动员讲话，要求大家加入中国国民党，以便在孙总理的领导下，共同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仲恺先生讲话后不久，我们全体同学便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这一天是我们所有黄埔一期同学终生难以忘怀的。清晨，我们近五百名师生，列队肃立在军校门前，恭迎总理孙中山先生前来参加开学典礼。上午八时，中山先生偕夫人在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张继、林森、伍朝枢、谭延闿、程

潜、邵元冲、许崇智、李福林、孙科等人陪同下莅临军校。那天，中山先生头戴“拿破仑”式白帽，身着笔挺的白色中山装，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一边率领先行，一边频频向我们还礼致意。随后，中山先生在军校大操场上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向我们作了题为“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的长篇演讲。

中山先生在训示中开宗明义，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的事实……这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中山先生接着指出：“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份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的革命军。”

中山先生站在讲台上，神态安详，目光炯炯，深入浅出地以其毕生从事革命事业所得出的深刻教训，谆谆教诲

我们。讲台下鸦雀无声，师生们列队肃立，凝神静听。我因自幼就非常崇敬中山先生，此刻又是平生第一次瞻仰到中山先生的丰采，并亲耳聆听他的教诲，心情的确兴奋极了。想到小时候曾将眼前的孙总理想像成像关云长、赵子龙一样的人物，亦不觉感到好笑。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中山先生，努力将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铭刻在脑海里。真没想到，像中山先生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讲话竟是这样通俗明了，使人一听便懂，更没有想到，革命竟是如此艰难、曲折，成立革命军队的意义竟是如此关键、重大！

在谈到如何做革命军时，中山先生又说：“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据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

中山先生教导我们，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先生讲授的东西，还要善于研究和思考，学会举一反三，自己推广。尤须注重自修功夫，研读一切有关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和杂志报章，以期达到融会贯通。

中山先生还特别强调了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黄埔军校在开办的时间、人数和器械上，条件均比北方官僚军阀开办的军校差得远，但由于我们有了救国救民思想和革命的志气，就一定能够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新国家。中山先生告诫我们：“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

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学到老，死记得满腹的学问，总是没有用处。”

中山先生指出：“……当革命军的资格……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

中山先生的这一席教诲，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教训，阐明了黄埔军校的宗旨，提出了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真似一场春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仿佛觉得自己的思想、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那时我还是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学生，虽有一腔爱国热血，但当时对许多革命道理和建立革命军队的意义及宗旨，还是十分隔膜的。中山先生的长篇演讲是给大家上了第一堂生动实际的政治课，使我们开始懂得了建立革命武装对于完成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以及革命军人所肩负的救国救民的重任，也更加坚定了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举行过开学典礼后，军校即转入正式的学习和训练生活。与旧式军校不同，黄埔军校仿效苏俄的建军原则和制度，除在校内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外，在教育内容上亦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要求培养出既善于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作战的革命军官。

军事教育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步兵的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等。虽然学习属于速成性质，但我们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比较系统地掌握了从

单兵训练到指挥排、连、营作战的主要军事科目。按照当时的常规，学完这些课程一般需要三年时间，我们前后却只用了半年，其紧张、刻苦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军校采用的军事教材基本上都是由苏联顾问提供的，无论从军事理论或军事技术角度上看，内容都比较新，也很适用。但由于军事教员多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在课程教授中又往往沿用这两所学校的传统方法。不过，教员们在工作中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有时甚至达到十分严厉的地步。记得有一位教授劈刺的日籍教官，对我们的要求就极为严格。他自己精通技击，上课时总是先认真地讲授各种动作要领，并辅之以示范动作。经学生们相互演习后，他常常接连唤儿名学生出列同他格斗，以检验学生的勇气和学习成效。我们哪里是他的对手？往往经三五个回合，便被他毫不留情地击倒在地。所以大家既敬他，又怕他。应当说，我们这些黄埔学生日后走上东征和北伐的战场，破敌攻城，屡建战功，显示出比较过硬的军事本领，除了有一股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在黄埔军校期间受到的严格的军事教育。

政治教育方面，军校以向学生传授基本的革命知识和理论为主，主要是进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也灌输一些马列主义思想。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苏俄研究、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等。除了这些正式课程外，军校还经

常举办各种专题演讲。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其他重要人士汪精卫、胡汉民、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邵元冲、戴季陶等都曾在军校作过演讲。

这一时期革命思想的灌输和熏陶，在我们黄埔同学头脑中打下了深刻的革命和爱国主义烙印，使我们这些以前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比较幼稚的青年人，逐步开拓了政治视野，认清了国民革命赖以取得成功的一些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如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和打倒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封建军阀；坚持国共合作，唤起民众，是完成国民革命的基本条件；革命军队肩负着以武力摧毁封建军阀统治和列强在华势力，最终统一全国的重任等等。正是基于这种革命思想的教育，才极大地唤起了我们的革命和爱国热情，并建立起一支由我们这些军校学生为骨干的、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革命队伍。

当然坦率地说，在我们几百名第一期同学中，每个人的思想状况也不尽相同。我本人的思想当时还算是比较进步的，但仍有很大局限。譬如我对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异同就搞不清楚，根本未认识到中国革命最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虽然愿意亲近并很尊敬师生中的共产党人，但对他们的信仰和根本政治主张却了解得甚少，这也是我当时思想上虽倾向于共产党人，却始终未加入中共的原因。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一些可敬的师长和同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廖先生是孙总理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之一，是当时国民党的著名左派，思想非常革命。他坚定地贯彻孙总理制

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遗余力地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和合作，因而在国共两党内和黄埔军校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成为当时最受革命同志敬爱与拥戴的政治领导人之一。最难得的是，仲恺先生一点没有官架子，待人热诚恳切，讲话又懂得抓住大家的心理，因此同学们最喜欢同他谈话。他工作很忙，不能经常到军校来，但一来即被同学们亲热地团团围住，争着问长问短。谁也舍不得离开他。每逢此时，仲恺先生总是满面笑容地解答同学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学习、训练和生活情况。在这种无拘无束、气氛热烈的谈话中，使我们往往受到很大的教益。直到今天，每回忆起黄埔军校时期的火热生活，仲恺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另一位在黄埔军校同学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师长是邓演达将军。邓将军是广东惠阳人，当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年纪，但其身材魁梧，举止稳重深沉，不苟言笑。平素他总是身着笔挺的军装，走起路来目不斜视，步履坚定，一副典型的军人风度，非常威严。开始我们都很怕他，以后相处久了，才知道他外表严厉，心地却极好，不仅工作认真、练达，而且待人热情诚恳，平易可亲。入学初，他兼任学生总队长，始终坚持与人家同甘共苦，一起生活和操练。邓将军对军校师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执行纪律一丝不苟。有一次，政治教官高语罕早晨起床迟了一点，他当即严肃批评了他。虽然他们之间私交甚好，但高犯了校规，邓将军毫不徇私情。这件事对师生教育很大，以后再也无人敢无

故松懈偷懒。不过，若是发现谁遇到什么困难、烦恼，或是生了病，邓将军总是嘘寒问暖，亲自抚慰体贴，仿佛是在待自己的兄弟手足一般，确实有一种对同志亲爱精诚的友爱精神。在我们眼中，邓将军既是一位威严的师长，又是一位仁爱可亲的长兄。我们都衷心爱戴他，特别愿意与他接近。因而他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很快成为威信仅次于廖仲恺先生的师长，受到两党同志的一致尊敬和拥护。当然，邓演达将军之所以能同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感情，除了他这种工作认真，办事公允，严于律己，能力超群，以及他关心同志，诚挚待人等优良品质外，主要是由于他思想进步，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地贯彻孙总理的思想和主张，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国共两党间的精诚合作，是一位与仲恺先生一样坚定的革命家。可惜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将军终因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而于1931年秋被国民党政权杀害，中国革命由此失去了一位栋梁式的人物。

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是深受同学们尊敬的师长之一。他的前任是戴季陶先生和邵元冲先生。这二人封建思想很浓厚，讲课时很少涉及中国国民革命的现实问题，却喜欢大谈封建伦理纲常那一套，把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也说成是中国传统道统——孔孟思想的延续，大家听了都很反感。特别是邵先生，我们背地里称其为“催眠术教官”。恩来同志主持政治部工作以后，军校的政治工作焕然一新。他对军校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常常亲自讲课。那时他仅二十余岁，英俊潇洒，双目炯炯有神，讲话时声音

铿锵有力，简明扼要。特别是他讲课的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新颖，颇受大家欢迎，因此在同学中威信很高。虽然他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我们第一期同学就毕业了，我本人与恩来同志更多的直接接触，还是在稍后的东征途中和建国以后，不过在黄埔军校时，恩来同志就已经是深受我们崇敬的师长了。

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将军，也是普遍受到同学们尊敬的人。由于他常常亲自带队出操，故与我们有一定接触。何将军平时讲话不多，但为人宽厚，办事稳当，在军事上尤为内行，枪法也打得很准，使我和许多同学深为敬服。以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他成了我们的老长官，一直受到部下尊敬。

军校校长蒋介石先生是一位在我个人前半生经历中起很大影响的人，从进入黄埔军校到祖国大陆解放，我前后共跟随了他廿余年。蒋先生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待部下威严，令人敬畏的官长。他性情严肃、刻板，十分注意仪表，平时出入军校，都身着军装，足登乌黑锃亮的长统马靴，戴着雪白的手套，并有卫兵跟从。我们很少敢于接近他讲话，有时迎面碰上，也必须规规矩矩地远远站定，向他敬礼，待他走过后方敢行动。不过，他一般并不轻易处罚学生。我在军校时只见他发过两次脾气，一次是因军校师生换装，队长以上官佐的军服质料好一些，有位队长就此提了意见，其实也无恶意，却不知怎么触怒了蒋先生，他当众大发了一阵脾气，将那位队长关了几几天禁闭；另一次是一位学生队长与几位同学闹矛盾，一直闹到校部，要求

面见廖党代表解决。蒋先生答复说，廖党代表很忙，平时不在学校，他是校长，有事可对他讲，但其中一位偏执意不肯，蒋先生对此事本已不快，见那人如此固执，不禁大怒，将其痛骂了一顿，差点又关了他的禁闭。当时我碰巧有事去校部，故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在军校学习期间，我同蒋先生只有过一次私下谈话。那时他就住在军校内，几乎每星期都要找学生个别谈话。某次我与其他三四位同学一起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然后轮流进去见他。轮到我时，心中颇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应对。蒋氏见我进去，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花名册，方问：“你叫郑洞国？是哪里人啊？”我赶紧立正回答说是湖南石门人。他接着问起我家中的情形，为何要来投考黄埔军校，以及能否过惯军校生活等等，我都一一作答。他的浙江奉化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所以不得不格外留意听他讲话。我说话时他嘴巴里“嗯，嗯”地应着，末了又勉励了我几句，就结束了这次召见，待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才发现自己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

虽然我在军校期间同蒋先生的直接接触不多，但精神上受其影响还是不小的。一方面，由于他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向我们灌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等信条，使我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绝对服从他的意识；另一方面，蒋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其事业的捍卫者，因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信赖和拥戴。大革命初期，蒋先生确实是以革命左派的形象出现的，在他那个时期的言行中，大多充满了激烈的革命倾向。例如在

他对黄埔军校学生的演讲和训示中，曾多次强调国共合作对于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一再申明两党同志要亲爱精诚，共同奋斗，“谁反对共产同志，谁便是反对革命”。某次，他甚至慷慨激昂地当众宣布：倘将来有一日他有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同志之举动，则大家均可起而反对他，也可枪毙他。对蒋先生的这些话，我当时确是信而不疑的，故更加深了对他的敬仰。

总的说，在与蒋先生的关系上，我最初受着双重意识的支配：一方面基于旧的“忠孝”意识而绝对服从蒋氏的权威；另一方面则出于革命、爱国的情感和信念，将蒋氏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来拥戴。在大革命蓬勃发展时期，这种双重意识背后隐藏着的矛盾并不明显。然而一旦国共两党决裂，以蒋氏为代表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这种双重意识便立即在我的头脑中发生了尖锐冲突，由于我个人的思想局限，结果使前一种思想意识占了上风，这是我终生引以为憾的事情。

第一期同学中，对我思想影响较大的是王尔琢、黄鳌、贺声洋三人。我们都是湖南同乡，又曾在一起报考军校，思想亦比较接近，故入军校后感情格外亲密，情同手足。每逢节假日，我们常常相约乘船去广州市区游玩，或轮流做东吃馆子。那时军校发的薪饷很少，所谓吃馆子，其实也就是每人吃碗面罢了。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上课、训练的间隙，坐在黄埔岛临江的树丛中讨论政治问题。谈话的题目一般都是当时的时局和国民革命的前途等等。我们在讨论中难免经常发生一些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

赤，但彼此都从未因此产生过任何隔阂。那时除我以外，他们三人又都是共产党员（但身份不公开），其中黄鳌年纪最长，他不仅思想进步，为人正直，而且很有才气，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在我们中间俨然是老大哥，他的观点和看法也往往是最有份量和说服力的。应当说，那一时期我的思想比较进步，与黄鳌等人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可惜这三位好朋友均早已故去了。大革命失败后，王尔琢参加了南昌起义，后随朱德元帅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会师，任红4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成为红军早期的一位杰出指挥员，不幸于1928年为叛徒杀害；黄鳌也于大革命失败后，在贺龙元帅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1929年在湘西的一次战斗中阵亡；贺声洋则听说曾去苏俄留学，回国后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而受到党内严厉处分，不久又患了肺病，他在消极中脱了党，后于30年代初因病死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每个人的变化都是很大的，其经历和结局也是难预料的，但与这三位好朋友的诚挚友谊，却始终未因岁月流逝而在我的记忆中冲淡。

除王尔琢等三人外，当时我与其他同学特别熟悉的虽不很多，但也都相处得甚为融洽。那时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很好，两党同志间确实洋溢着友爱精诚、同舟共济的团结气氛，使人处处感到革命集体的温暖。遗憾的是，后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军校中部分思想右倾的同学开始与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进步同学产生了一些矛盾。我们毕业后，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包括已毕业者）相继成立了两个政治上对立的组织：一个是以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学为首的“中国

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是由贺衷寒、潘佑强等同学发起的“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经常公开论战，关系搞得很僵。本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经蒋介石校长特许，在全体黄埔同学的支持、赞同下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和影响在广州的其他军校学生，免其成为军阀割据势力的工具。应当说这是一个正当合法的革命组织。蒋校长在这个组织成立时还亲自为其写了成立宣言。但此后一些右翼同学一直心怀不满，煽动说“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工具，随即于1925年冬另外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与之抗衡。1926年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先生以这两个组织违背亲爱精诚的校训，不利于同学团结为名，将其全部解散，另外成立了一个在他影响下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会”（简称黄埔同学会）。在这期间，我尽管既不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也未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不过，由于我受革命思想熏陶较多，加上受好朋友王尔琢等人的影响，故在思想感情上较接近于前者。

总的看来，虽然同学们中出现了上述矛盾，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当时两党同志的团结合作还是主流，在后来的东征、北伐战场上，绝大多数同学均能以大局为重，齐心协力，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

黄埔军校创办于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外反动势力的仇视，特别是在广州的一些军阀武装，更把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滇军将领范石生甚至公开叫嚣，要派兵缴掉黄埔军校数百名学生的枪械。那时广州外有盘踞在东江地区的陈炯明势力，时时企

图卷土重来；内有各省前来依附的军阀部队和广州反动商团武装，他们相互勾结，伺机起事。革命政权几乎每一天都面临着内外敌人倾覆的危险，环境十分险恶。

1924年8月，革命政府与广州商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广州城内谣言纷起，人心惶惶。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袭击，军校立即在四面环水的黄埔岛上实行了严密的警戒措施。白天我们除了照常上课、操练，还要抽出部分人员环岛修筑防御工事，夜间也要轮流担任警戒任务，防备敌人夜袭。虽然大家都很疲倦，睡眠尤感缺乏，但却无人叫苦发牢骚。我们都知道环境险恶，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故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

1924年10月，商团头目陈廉伯自恃有港英当局做后台，终于首先聚众发难，上演了一出商团叛乱事件的丑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年8月，商团武装在英帝协助下，私下购得大批枪械弹药，企图偷运进广州，以做日后叛乱之用。时孙中山先生正在韶关督师北伐，闻报后即电令蒋介石校长（蒋氏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将这批军火悉数截获，并扣留在黄埔岛上。陈廉伯等见事情败漏，遂恼羞成怒，一面威逼广州商人罢市，一面加紧勾结英帝，声言要与广东革命政府公开摊牌，不惜以武力解决问题。英帝也趁机兴风作浪，公然对广东革命政权发出战争叫嚣。这时广州的局势于我十分不利，忠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已随中山先生出师北伐，市内只有五百名黄埔学生武装和力量很弱小的海军，以及一部分工农赤卫队。其它驻广州的军队，有的隔岸观火，态度暧昧，有的则与陈廉伯暗中勾结，伺机

起事。鉴于环境恶劣，广东革命政府不得不在商团通电表示服从政府的前提下，于10月初勉强同意发还了部分枪械。但商团的反动气焰并未因此而稍减。10月10日，广州市的工人、学生及市民集会游行，庆祝“双十节”。游行队伍通过西壕时，受到商团团兵阻拦，双方发生争执，商团武装居然以排枪向游行队伍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民众百余人。次日，商团继续搜捕群众并封锁了部分市区，同时胁迫广州商人罢市。面对这种极其严重的局势，孙中山先生在中共和廖仲恺先生、蒋介石校长等人的积极建议下，经再三考虑，最后毅然决定回师广州，铲除商团之患。15日清晨，蒋介石校长指挥黄埔学生武装和部分广州卫戍部队，在广州工农赤卫队的配合下首先向商团发动攻击，刚刚赶回广州的北伐部队也迅速投入了战斗。商团武装虽然气焰嚣张，但其团兵多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亦无作战经验，故战至午后一时许，商团纷纷溃败，我军占领了位于广州西关的商团总部。16日，商团残部在我军包围下被迫全部缴械投降。当初骄横不可一世的商团头子陈廉伯，此时只好灰溜溜地躲进沙面租界的英国领事馆。至此，商团叛乱算是彻底平定了。我们黄埔师生在这次战斗中初试锋芒，先声夺人，表现十分出色，经受了一次实际的军事锻炼。遗憾的是，我所在的分队于战斗前被派到广东革命政府驻地担任警戒，未能亲身参加战斗。在后来的东征战役中，我才有了冲锋陷阵的机会。

在广东革命政府与广州反动商团武装进行较量的同时，中国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也正打的热火朝天。10月

下旬，直系将领冯玉祥将军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并组织了国民军。不久，冯玉祥将军又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也致电表示欢迎。中山先生接受了这个邀请，并于11月10日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发表《北上宣言》，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和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

11月13日，中山先生偕夫人乘轮船北上，途经黄埔岛，再度视察了军校，并观看了我们第一期同学的战斗演习。他在临行前接受全校师生的隆重欢送时，又谆谆嘱咐我们：“同学们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想不到，这番话竟成了孙总理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训。几个月后，这位为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耗尽了毕生精力的伟大革命家，便在北京与世长辞了！

11月底，广东革命政府相继在广州黄埔岛上正式成立了党军教导1团、教导2团。教导团的编制为三三制，即每团辖步兵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各团还配备有直属部队，如特务连、机关枪连、通信兵队、辎重队、卫生队等，共有兵员二千余人。此外，党军还仿照苏俄红军的制度，在团营连三级设党代表一职，加强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政治领导。

教导团的士兵除部分是广东人外，很多都是浙江、江苏、湖南、安徽、河南等省秘密招募的青年工人、农民，素质比较好。惟军队中的干部十分缺乏。为此，黄埔军校的一些教官、干部先后调入党军任团营连指挥官，如教导1团

团长为何应钦，沈应时任第1营营长，刘峙任第2营营长，王俊任第3营营长；教导2团团长为王伯龄，顾祝同任第1营营长，林鼎祺任第2营营长，金佛庄任第3营营长。同时，我们第一期学生也提前毕业，大部分被派到党军中任连排级干部。也许是上级认为我当时的思想进步些，所以派我到教导1团担任第2营第4连的助理党代表，不久原连党代表张其云（中共党员）调到湖北地区工作，我即接任了党代表职务。就这样，我结束了七个多月火热的军校生活，在革命军队中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二 第一次东征

平定商团叛乱以后，广州的局势并未彻底稳定下来。1925年1月，盘踞在东江潮汕一带的陈炯明乘孙中山先生北上，调兵遣将，准备分路反扑广州。为先发制敌，消灭陈逆反动势力，广东革命政府决定组成东征联军，进行东征。

2月初，东征联军按预定作战计划，分三路进军。本来，东征是以粤军第2师张民达部、粤军第7旅许济部，及黄埔学生军（教导1团、教导2团、黄埔军校第二、三期学员），共万余人为左翼军，任务是攻击河源、五华、兴宁一带；以滇军第1、2、3军（欠第1师），共三万人为右翼军，任务是攻击淡水和海陆丰一带；以桂军六千余人作为中路军，攻打惠州并策应左右两翼。但部队出发前，不知何故又变更部署，改以滇军为左翼军，经河源、老隆（今龙川）向陈逆部将林虎的防地五华、兴宁地区前进；以粤军和黄埔校军为右翼军，经淡水、海陆丰向陈逆另一部将洪兆麟的防地潮汕地区进攻。中路军桂军任务不变。

东征联军总司令为杨希闵，许崇智任右翼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时陈逆部下军队有七、八万人之多，在人数上较我占

优势。但其部将林虎、洪兆麟、叶举等相互猜忌，互不统一，易为我军各个击破。

2月1日晨，党军教导1团由黄埔岛上开拔。次日，教导2团和学生总队亦相继出发。4日上午，担任右翼军先头部队的粤军某部首先与敌洪兆麟部接仗，经短暂战斗后敌旋退去，我军于当日下午进占东莞。右翼军继续挺进，连下新圩、平湖、深圳等镇，直指敌重兵防守的淡水城。

这次东征是党军成立以来首次出兵作战，经过建军两个月来的严格训练和政治教育，部队的精神面貌和战斗士气极佳，官兵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初次随军出征，心情格外兴奋，天天巴望着早点与敌人对阵冲杀。岂知自出发后，一连十几天，我们第4连一直跟在大队后面行进，只能听到前面打得热闹，却捞不到自己冲锋陷阵的机会，不免有些焦躁起来。我们连连长姓马，湖北人，曾任黄埔军校区队长，颇有作战经验。他见我着急，笑着安慰我说：“老弟，莫急嘛！我看大仗还在后面。”不出马连长所料，两三天后，我们右翼军便在淡水城下与敌人展开了东征战役以来的第一场恶战。

2月14日，我连终于轮到做前卫连，走在全军最前面。下午，部队进迫淡水城。在距城西南几华里外的一片丘陵地带，我军与敌小股部队交上火，我指挥前卫排一个猛冲，便把敌人赶下了山坡。稍顷，马连长率后续部队赶到，我们跟在敌人后头穷追不舍，一连翻过几个小山头，直到敌人窜进城内为止。我平生第一次参加战斗，居然没有一点紧张、恐惧的感觉，仿佛这次追击战是一次登山越野比赛。

黄昏前，教导1团、教导2团和粤军一部陆续赶到，遂将龟缩在城内的敌人包围起来。

淡水北距惠州城仅70华里，城虽不大，但城垣坚固，城濠既宽且深，城外地势多平坦开阔，易守难攻。守城之敌约有三千余众，企图据城固守，俟驻惠州的大队援军一到，即开城夹击，挫败我军。

我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必须赶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攻克淡水，否则势将腹背受敌。为此，右翼军指挥部决定翌日拂晓发动总攻，限期破城。命令下达后，我教导1团、教导2团连夜进行了战斗动员，并组织了一支攻城奋勇队。当时部队的战斗士气极为高涨，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奋勇队，最后上级从中挑选了近百名精壮士兵和十名军官。军官多是各营、连的党代表，除我以外，还有李奇中、蔡光举、李汉藩等人。

2月15日拂晓，我军开始攻城，蒋介石校长亲自站在润井高地之炮兵阵地上指挥督战。霎间，敌人的几处城垣工事腾起浓烟烈焰，枪炮声连成一片。大约10分钟后，我们奋勇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分成几队，扛着六七架云梯向城垣迅速接近。敌人依城固守，疯狂地向外射击，一时弹如雨下。我到底是缺乏实战经验，见敌人打来如此密集的枪弹，一度有些心慌，但马上想到自己身为军官，绝不能临阵怯敌，况且在这开阔地势上，惟有迅速前进，万不可迟疑不决，故很快镇静下来，与其他一些奋勇队员一起，时而卧倒，时而跃起奔跑，不一会儿便接近了城垣。

我们刚刚冲下城濠，两名肩扛云梯的士兵即相继中弹

栽倒。我正欲纵身前去扛梯，身后忽地跃出几名士兵，敏捷地抬起云梯，飞快地运到城根下。谁知云梯刚一搭在城头上，即被敌人用铁叉推倒，以后反复几次都无法靠牢。此刻战斗已进入白热化状态，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每迟滞一分钟都会增加伤亡。正焦急间，身后有人大喊：“快卧倒，打敌人火力点！”我们立即就地卧倒，一起举枪向城头回击。卧在我右侧四五米开外的一名大个子士兵枪法极准，几乎弹无虚发，城头上的敌人只要一露头，即多半为他击中，敌人吓得只好躲在工事后面盲目向下打枪。城墙根下的几名士兵趁势将云梯牢牢地架在城墙上，奋力向上攀登。我也纵身跳到梯子旁，正待缘梯而上，忽然距我们右侧几十米外的几个敌人火力点一齐向我们开火，爬在最前面的一名士兵，眼看就要越过城头，却不幸中弹，手一扬便栽倒下来，紧接着另一名士兵也一声惨叫，中弹摔下。剩下的两名士兵一时不知所措，伏在梯子上犹豫了一下。我知道此时别无他计，只有冒死向上攀登，乃仰首厉声喝道：“不要停下，快，快上！”随即紧跟其后，一手扶梯攀登，一手挥动驳壳枪连连回击敌人。后面我军掩护阵地上的官兵们见此情景，一面呐喊助威，一面调集火力压制敌人。趁着敌人火力稍减，我们相继跃上城墙，大呼：“党军登城了！登城了！”凶猛地向着城头上的敌人扑去。敌人有些慌乱，但继续顽抗，双方在城墙上混战起来。

这时后继部队也陆续攀上城头，会合我们，将附近的敌人肃清，并向两侧发展，以扩大战果。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军也突破了其它几处敌人的城垣工事，教导1团、教导

2团官兵一批批拥上城墙，敌人顿时大乱，连滚带爬地向城内退去。粤军第7旅也乘机从城门攻入。我军从东、南、西三面压迫敌人，与敌展开短促而激烈的巷战。片刻后，敌人不支溃散，被我歼灭大半，有部分残敌沿北门向城外逃遁，我们乘胜追击。我率一小队官兵一直追出北门，占领了城门外的几处制高点。这时上级传下指示，命令各部停止追击，抓紧抢修工事，准备迎击敌人援军。这次攻城战斗，前后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当日下午，惠州方面的敌援军果然气势汹汹地赶到，与我军在淡水城东北一带的山地上展开激战。我第4连奉命扼守城北两处相邻的高地，顽强地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临近黄昏时，我们正面的敌人似乎已成强弩之末，进攻的势头逐渐缓和下来，教导1团的官兵们却愈战愈勇。何应钦团长抓住战机，果断地命令全团出击。我们纷纷跃出阵地，像猛虎下山般地向敌人扑去。敌人未料到我军苦战一天，竟还能发动如此凶猛的攻势，被杀了个措手不及，未及认真抵抗即被冲垮，漫山遍野地向后逃窜。我军士气更盛，紧紧尾敌追击。当时各营连之间已顾不上相互联络，各作战单位分头追击，哪里有敌人，便往哪里冲。我率领一排官兵，离开大队，沿着崎岖的山路追出很远。行进间，忽见前面一座山头上有些敌人，约一连兵力，正乱糟糟地向我们打枪，我们一个猛冲，就把敌人赶下山。

这时天色渐晚，大家杀得性起，正待穷追下去，却听到后方远远地传来集合号声。我不禁有些奇怪：既然打了胜仗，上级为何不准继续追击呢？回到城内，才知道教导

2团由于团长王柏龄麻痹大意，指挥失当，被敌人一度冲垮，我军后方的一部分辎重和行李也被敌人掠走了。直到蒋校长亲自赶到才勉强将阵脚稳住，待粤军第7旅、教导1团闻讯向上增援时，敌人始向沙坑方向退却，淡水战役遂告结束。

蒋介石校长对王柏龄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大为不满，据说曾当场痛骂了他一顿，事后把他的团长职务也撤掉了。不过，整个党军部队在战斗中的表现却是相当出色的，全体官兵无不奋勇争先、以一当十，大振党军军威，使敌人从此不敢再轻视这支革命的军队。

东征右翼军在淡水城整顿了四、五天，指挥部调升沈应时为教导2团团长。因沈氏在攻城战中负伤，乃以钱大钧暂代。

2月20日前后，部队继续向惠东（今平山）方向前进。行至一个叫做羊塘圩的地方时，我军与洪兆麟的大部队遭遇上了。那天恰巧又是第4连做前卫，我们首当其冲，与敌人交火了。敌人初时欺负我们人少，企图从左右两翼包抄我们。马连长和我指挥部队占据了一个长满树木的山坡地带顽强抵抗。不多时，我军后续部队赶上来投入战斗，对敌人实施猛烈攻击。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军支持不住，全线动摇。我连抓住战机，立即发动反冲击，将正面之敌击溃。这时左右两翼的敌人也纷纷开始溃逃，我们随同友邻部队一起紧紧尾追，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敌人遗弃的伤兵、武器和行李物品。

第4连动作较快，一直跑在最前头。正追赶间，忽听

“砰！砰！砰！”一阵排枪枪弹从我们头上掠过，我们未及卧倒，紧接着又是一阵弹雨袭击，有几名官兵当场伤亡。我们隐蔽好一看，原来是一伙残敌盘踞在左前方一座陡峭的山头上阻击我军。马连长急切地对我说：“现在追击要紧，不要同小股敌人纠缠。党代表，你带一排人对付这些家伙，我率两个排继续追击。”“好，第一排跟我来！”我答应了一声，即率一排官兵隐蔽着向那伙敌人接近。山头上的敌人见我们人少势单，居然从山上反扑下来。我们伏在山脚下的树丛中，等他们冲到山腰，突然以排枪射击，一下就撂倒了十余个敌人，然后乘势冲上去与敌人肉搏。敌人慌了，胡乱招架一下，掉头就跑。我们咬住敌人的屁股不放，一口气追出十几里山地，沿途又先后消灭一批敌人，直到剩下的敌人逃得不见了踪迹，我们才掉头下山与大部队会合。

这次战斗结束后，上级调我到教导2团担任第3营党代表。该营原任党代表蔡光举在参加奋勇队攻打淡水城的战斗中不幸阵亡，我是补他的缺。第3营营长是金佛庄，浙江东阳人，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中曾任第三学生队队长，还是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当时就是比较有声望的同志，故我对他十分敬重。但金氏却不以师长自居，待我很诚恳热情，以后我们共事得非常好。

右翼军一路且战且行，进占惠东后，又向海丰挺进。可恨天公不做美，那些天大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官兵们常常被滑倒，每人一身泥水，行军十分艰难。我的背包在淡水战斗中丢失了（那次由于教导2团在淡水城下一度被敌人冲垮，许多官兵的背包都叫敌人掠走了），身边军毯、

衣服皆无，幸好在战斗中缴得一件军大衣，白天就披在身上抵御寒风，夜间则用它做铺盖。可身上穿的军装经过风吹雨淋和一连串的行军作战，早已破烂不堪，军裤自膝盖以下都撕成布条，儿不能遮体，无奈我只好向老百姓买了一条便裤穿上。其实类似这种情况的也非止我一人，行军时人人都是衣衫褴褛，浑身汗水和泥巴。

尽管条件艰苦，但是部队上下却始终精神饱满，士气高涨。那时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开展得非常好，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经常在行军、作战空隙亲自召集各团、营、连党代表开会，了解部队情况，检查军队纪律，商讨和布置政治工作任务等等。同时还组织了许多政治宣传队，沿途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对于部队官兵鼓舞很大。过去在黄埔军校时，我们就十分尊敬恩来同志，在这次东征战役中，由于工作关系，我们直接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彼此也熟悉了。周恩来主任那种待人恳切谦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以及在工作中显示出的卓越才干，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使我更加敬重他。

2月底，右翼军占领海丰，3月初，又占领揭阳，洪兆麟残部望风披靡。我军分兵占据了洪氏的巢穴潮州和汕头。

就在右翼军捷报频传、节节得胜之际，整个战场上的形势却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原来，担任左翼军中路军的滇军、桂军根本无意与陈炯明部队作战，一面按兵不动，消极避战，一面暗中与敌将林虎等人勾结，签订密约。不久，杨希闵的滇军便从河源、龙川撤兵，刘震寰的桂军也屯于惠州城下不动，佯作攻城之态，使林虎得以从容调集两万

余精兵，由其老巢兴宁、五华等地分路急速南下，抄袭我军后路，企图一举将我歼灭于揭阳、潮汕地区。当时的事态极为严重，林虎是陈炯明手下猛将，向以作战凶猛著称，其兵力亦数倍于我军。我军则久战疲惫，以寡敌众，一旦作战失利，即有全军覆没之危险。

右翼军指挥部侦知敌情后，决定以粤军第2师张民达部守潮汕，以学生总队守揭阳，蒋介石校长、周恩来主任亲率教导1团、教导2团和粤军第7旅许济部全力迎击敌人。双方在棉湖一带地区相遇，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恶战，这便是著名的“棉湖战役”。战役经过如下：

3月12日正午，党军及粤军第7旅开抵普宁城，我谍报人员报称，敌人已到达河婆，正分左右两路向我奔袭，前锋部队距棉湖仅数华里。蒋校长即命教导1团、教导2团抢占棉湖、池尾两地，正面迎击敌军。另着粤军第7旅向棉湖以北敌之左翼迂回攻击。可是，由于敌情变化和联络困难，该旅在迂回运动中越走越远，竟未能与敌相遇，敌军遂于13日晨集中万余人直向棉湖我教导1团正面猛扑而来，我军亦迎面予以痛击，于是，棉湖大战的战幕正式拉开。

交战之初，敌人气焰嚣张得很，不断投入大批兵力潮水般地向我正面阵地涌来。扼守该处阵地的教导1团第1营拚死作战，反复冲杀，并数度与敌展开剧烈的白刃战，始将敌人击退，双方死伤累累。

敌人见正面难以得手，又转以强大兵力向我左翼第3营发动凶猛攻击。该营奉命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与敌鏖战，

何应钦团长从作为预备队的第2营中抽出一连兵力向前增援。敌人自恃兵多，乘我第1营、第3营结合部空虚，又有千余敌人突入教导1团团部驻地曾坑村，距团部仅百多米。第2营营长刘峙亲率步兵一连在炮火掩护下将敌人逐出该村。

在战况万分紧急之际，从广州匆匆赶来的廖党代表偕蒋介石校长、周恩来主任及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等亲赴前线指挥督战，我军士气大振。

临近中午，敌人再度增兵反攻，目标指向曾坑村，我军亦将最后一连预备队投入。两军浴血厮杀，相持难下。这时我方已将预备队全部用尽，而敌攻势如故，情况确已到最后关头。当敌人突入至离团部仅二三十米远时，何应钦团长亲率特务连及团部全体勤杂人员投入战斗，以各种轻重武器向敌人猛扫，绝不后退半步。敌人虽竭尽全力反复冲锋，终未得逞。

教导1团官兵在这场殊死战斗中表现得极为英勇，自团长以下官佐，均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广大士兵亦无比顽强，一人尚存，死战到底，以至成班、成排地牺牲在阵地上。当时亲眼目睹这一惨烈战斗情景的苏俄顾问加伦将军也不禁为之万分感慨地说：“党军以区区千余之众，独挡敌两万余重兵进攻，打得如此英勇顽强，为战争史上所少见。党军不愧为天下第一流的陆军。”

大战爆发前，教导2团正在教导1团左翼向前运动，两团相距约十余华里。晨七时许，教导1团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而且一阵比一阵密集。从枪炮声中不难判断，这

是一场规模相当大的激烈战斗。按照一般的作战规则，我团应立即向敌右翼迂回包抄，果断地攻击敌之侧背，这样既可使敌人两面受敌，又可掩护我教导1团左翼。但团长钱大钧虽长于军事理论，却无实际作战经验，且处事优柔寡断，不敢采取坚决的行动，一意等待着指挥部的命令。从晨至午，教导2团走走停停，徘徊不前，以致坐失战机，独使教导1团以寡敌众，与敌浴血奋战，历尽险境。正午时分，仍未见指挥部送来命令，但棉湖方面的枪炮声愈加激烈，全团官兵再也按捺不住，纷纷请求出击。钱大钧仍不允。第2营营长刘尧宸，为人爽直痛快，且作战勇猛过人，于军中素有威望。他见军情十万火急，再三请求无效，气得大怒，乃独率该营向前出击。钱大钧这才下令第3营迅速占领左翼高地，掩护我军侧翼；以第1营为团预备队，跟随第2营前进。

稍顷，第2营同敌人打响了。营长金佛庄判断敌人亦有可能抢占左翼高地压制我军，同我商议后，即派第9连就近火速上山抢占阵地。第9连刚攀上高地，果然发现大批敌人也纷纷赶至，双方相距仅数十米。该连当即开火，将前面敌人击退，但后面敌人愈来愈多，仗着人多势众蜂涌而上，双方遂在山地两侧展开恶战。十几分钟后，金营长和我率后续部队赶至，马上投入战斗。我登上山顶往下一看，山坡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敌人，正边打枪边嚎叫着向上冲。我想幸亏我军抢先了一步，倘若敌人先占据了高地，居高临下俯击我军，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酣战中，金佛庄和我往还于各阵地之间，指挥官兵

用排枪向敌人射击，冲在前面的敌人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伤枕藉。可是后面的敌人在军官的驱赶下仍不顾死活地涌上来。第9连连长陈铁（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作战很勇敢，眼见敌人已冲上阵地前沿，挥枪大声叱呼，率先跃出与敌人肉搏。阵地上白刃闪闪、血光四溅，喊杀声、铁器撞击声混成一片。五分钟后，我率两排士兵从斜侧里切断敌人的进攻队形，配合第9连肃清了阵地上的敌人。自此以后，敌人进攻锐气顿挫，许多敌军士兵大概领教了我军排枪和刺刀的危害，任凭其指挥官如何吆喝、咒骂，只要进至我阵地前三四十米处，即伏倒在地，不敢向前。

战至黄昏，我军乘敌疲惫，突然发起凌厉反击，经过一阵短促的肉搏战，终将敌人彻底击溃，山坡上的敌人丢掉武器和伤兵，争先恐后地掉头逃命。

这时第2营的正面进攻已经得手，并向棉湖之敌侧背攻击。敌人在我军冲击下被迫后撤，教导1团左翼遂趋稳定。在此之前，粤军第7旅已闻讯赶至教导1团右翼加入战斗。我军士气益振，即发动全面反攻，林虎的军队久战不下，已成强弩之末，在我军凌厉的攻势下，像山崩一样地溃败下去。我军乘胜追击，沿途歼敌甚众，道路上、田野里，到处丢弃着敌人的尸体、枪支和各种物资。

棉湖之战，我军以寡敌众，一举将陈炯明最精锐的部队全部击溃，取得前所未有的大胜利，充分显示了革命军队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广大官兵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此后，党军声威赫赫，使敌闻风丧胆。

棉湖大战后，我军未及整顿，即向林虎的老巢五华、兴

宁挺进。行军的序列是教导1团在前，教导2团居中，粤军第7旅殿后。行至揭阳，部队奉命向北取小路，连夜强行军奔袭五华城。那一夜我们马不停蹄，疾走如飞，整整赶了一百余华里路，抵达五华城外时，刚晨曦微露。敌人未料到我军行动如此神速，竟毫无知觉。我前头部队乔装成林虎部队，佯称回城搬运子弹，赚开城门，一拥而入，迅速将守军全部缴械。

袭破五华后，教导1团奉命留守，教导2团于19日晨继续向距五华三十余华里的兴宁前进。这时林虎正亲自坐镇兴宁，收集残部以图固守。

教导2团抵达兴宁后，刚从广州开来的粤军吴铁成旅亦赶至，我军即开始攻城。敌人抵抗十分顽强，我们于当天多次组织强攻均未奏效，伤亡不小，第2营营长刘尧宸也在攻城战中负伤。次日，我军改强攻为智取，利用该城西南角的有利地形，乘夜色潜伏城下，一举偷袭成功，我营第9连和第2营第4连最先攻上城头，大军随即涌入，城内敌人大乱，惊呼：“学生军进城了！”各自逃命。经少许战斗，守敌大部被歼，林虎率少数亲信仓皇出逃，窜往江西，兴宁即告克复。

与此同时，粤军第2师张民达部由潮汕沿韩江北进，连克黄冈、饶平、梅县、大埔、蕉岭等地，洪兆麟只身逃往上海，残部则溃入闽境，第一次东征战役遂胜利结束。

东征战役期间，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当时棉湖大战爆发在即，为避免影响士气，先未敢在军中公布这一不幸消息。直到我军克复兴宁后，指挥部才于3月

21日正式宣布孙总理病故噩耗，并在兴宁举行了隆重庄严的追悼大会，全军上下一齐举哀，官兵悲痛万分。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特别是他晚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真诚地建立起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并由此造就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中山先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奠基者，也是黄埔党军的缔造者。为了复兴国家民族，他呕心沥血，耗尽毕生精力，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功绩和他崇高的爱国革命精神，将永垂史册，为万世景仰！

4月11日，党军奉命移驻广东梅县整训，部队改编为党军第1旅，何应钦将军任旅长，下辖教导1团、教导2团和其后不久在广州成立的教导3团。

三 讨伐杨希闵、刘震寰

我们在梅县驻扎不久，广州就出了问题。原来，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两部趁党军及其它驻广州的军队大部出征未归，乘虚窜回广州，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一面派密使与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勾结，一面公开在广州发动叛乱。

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原是地方军阀部队，根本没有爱国思想，亦无革命信念。1923年陈炯明于广州发动叛乱后，杨、刘二人企图借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声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遂假追随孙中山先生之名，出兵逐走陈部，进驻广州，并一手把持了广州的财政大权。随着其势力的扩充，杨、刘二人愈加骄横，恣意胡作非为，不肯听从革命政府的指挥和调遣。在东征战役中，他们与林虎相互勾结，按兵不动，使林得以从容集中重兵与我党军决战，意在假林虎之手致党军于死地。及至林虎溃败，杨、刘二人与林虎暗中来往的书信、密电均为党军搜获，二逆见阴谋败露，更不自安，遂决意发动叛乱，以武力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滇军、桂军开回广州后，杨希闵自封为滇桂联军总司令，其司令部设于市中心的八旗会馆，又任命周自得为广

州卫戍司令、赵成梁为广东省长兼前敌总指挥。叛军在市区宣布戒严，分兵占据了各交通要道，并布置重兵于瘦狗岭、白云山一线。

此时，在广州忠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只有福军李福林部三四千人和警卫军吴铁成旅的一团兵力，力量单薄。滇桂联军叛乱后，吴铁成的一团军队被迫随同政府各机关撤至珠江南岸，同福军会合，与叛军隔河对峙。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政府首脑亦避往黄埔岛上之长洲要塞司令部。

杨、刘二逆控制广州市区后，自以为得计，气焰更加嚣张，竟嘲弄以代大元帅名义斥责叛军的胡汉民先生说：“请代帅下令先攻我三天，然后我再还手。”其狂妄无礼真是到了极点。

5月13日，廖仲恺党代表亲赴汕头东征军司令部，会商平定杨、刘叛乱计划。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允许洪兆麟、林虎残部投诚；我军暂时放弃潮梅地区，除留少数部队监视洪、林等部外，全军回师广州平叛。21日，蒋介石先生亲率党军第1旅何应钦部、粤军第1旅陈铭枢部、粤军第4师许济部（由第7旅扩充）、警卫军吴铁城旅（吴氏本人不在军中）分两个纵队，沿原东征路线回师广州。

6月4日，广东革命政府通令谴责滇桂联军的叛乱罪行，并撤销了杨希闵、刘震寰的本兼各职，另委朱培德将军任建国滇军总司令。

革命军于6月9日进抵石龙。同时，原驻北江、西江的湘军谭延闿部及粤军第1师李济深部（欠陈铭枢旅）也

经三水、新街向广州疾进。

这时，滇桂联军出现内讧，杨希闵部将胡思舜、廖行超等欲自成一股势力，不听从杨、刘指挥。这样一来，叛军内部不相统一，迟迟制定不出一致的军事部署，只得在各路革命军逼近广州时仓促应战。

6月11日，党军第1旅首先在广州东郊之石滩车站与敌接触，经几小时激战后占领该车站。随后，党军和粤军第1旅分左右两翼向敌重兵防守的龙眼洞、观音山、瘦狗岭、白云山一线进迫。粤军第4师奉命调头迎击由惠州增援上来的部分滇军。

固守龙眼洞、观音山、瘦狗岭、白云山一线阵地的是杨希闵装备精良的六个团。滇军虽腐败，且官兵均吸食鸦片，素有“双枪将”之称（滇军士兵每人随身携带一支钢枪、一支烟枪，故得名），但其官兵只要过足烟瘾，作战还颇凶顽。11日下午，我军同敌人硬碰硬地打了近半日，党军攻击敌人据守的瘦狗岭一线阵地，粤军第1旅攻击敌之白云山一线阵地，但均遭到滇军顽强抵抗，进展不大，双方互有伤亡。

12日拂晓，我军发动全线总攻。党军集中炮火和轻重机枪火力向敌瘦狗岭阵地射击，继以步兵发动持续猛攻，进攻顺序是教导1团在左，教导2团在右。半小时后，我营突破敌前沿阵地，迅速向纵深突击。敌人几度反击，均被我军击溃。临近中午时，我军即控制了瘦狗岭南北之线，歼敌甚众。粤军第1旅亦攻占了敌之白云山阵地。这时湘军、福军和粤军第1师等部队亦先后投入战斗，滇桂联军四面

受敌，穷于应付。

在两军酣战之际，张治中将军和苏联顾问契齐班诺夫率领一支由黄埔学生组成的二千余人的突击队，于黄埔上游猎德炮台附近上岸，出其不意地向广九路方向出击。敌人万没料到背后会杀出这样一支奇兵，阵脚大乱，我军前后夹击，继续攻占了敌之前敌指挥部广九车站。至此，敌军全线崩溃，混乱不堪地向市区逃窜。

值得一提的是，停泊在黄埔港中的飞鹰舰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本是一艘年久失修、早已废弃不用的坏船。在战斗的紧要时刻，苏联顾问契齐班诺夫命人将其拉至猎德炮台附近，重新装备了大炮，并亲自发炮助战。事也凑巧，刚好有一发炮弹飞进广九车站赵成梁的司令部，将正在室内陪同杨希闵吃饭的赵成梁当场炸成几段，一命呜呼。杨希闵吓得面无人色，急忙窜回市区。滇军群龙无首，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遂被我军彻底击溃。

杨逆逃回其设在八旗会馆的指挥部，起初还想布署部队做最后的抵抗。岂知兵败如山倒，军心早已瓦解，街头上一群群滇军士兵到处乱窜，各自逃命，已无法掌握，连他手下的亲信将领们也都纷纷溜之大吉。这时城内的交通水电均被广州工人破坏，八旗会馆孤伶伶地矗立在市中心。杨逆自知大势已去，只好逃往沙面英租界避难。

我各路革命军浩浩荡荡地向市区挺进，迅速解除了滇军残部的武装。滇军一败，桂军更加势孤，被迫退往西村，不久即被湘军、粤军等部全部缴械。刘震寰亦仓皇遁往沙面英租界。

把持广州达两年之久，号称四、五万人的滇桂军，仅经一天多的激战，就被革命军队彻底消灭了，从此消除了威胁革命政权的一大祸患，广州革命根据地日趋巩固。

平定杨、刘二逆的战斗结束后，我们党军第1旅均驻扎在北校场营房内。营房的后面是一片不大的开阔地，开阔地的尽头有条堤坝，一条小河顺着堤坝从营房边流过。翻过堤坝，再往后便是蜿蜒起伏的山地。

由于战斗刚刚结束，部队放假几日休息。6月15日上午，我闲着无事，坐在房中读书，其他官兵多在小河边洗衣。约九时许，营房后面突然枪声大作，还夹杂着呐喊声由远而近。我知情况有变，提起驳壳枪刚要跑出去察看情况，营部一名传令兵已推门闯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党……党代表，后面山上有敌情！”我几步跃出营房，只见上千名敌人正从营房后面的山头上袭击下来，冲在前面的已接近那条堤坝，距营房仅几百米。由于情况突如其来，大家均无准备，许多官兵等不及命令，即纷纷取枪就地抵抗。这时我身边已聚拢了三十余名官兵，我马上指挥大家穿越开阔地，向敌人实施逆袭，其他各营连的官兵，都在无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几十人一股，自动向敌人反冲击，甚至有的士兵孤身一人，也毫无惧色地端着枪向敌人扑去，双方遂在山脚下展开激烈的混战。几分钟后，各团团长、营长相继率部队赶到，我军士气大振，全体官兵个个像老虎一样朝敌人占据的山头猛冲猛打，势不可挡。敌人原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却未料到遭到党军如此顽强、勇猛的反击，只好落荒而逃。我军猛追不舍，直到将这股敌人全

部追歼后才收兵。事后查明，这批敌人是滇军第3军胡思舜部的残兵败将，约三、四千人，先在我军攻占石滩车站时，该敌退往增城方面。现在企图乘我不备，偷袭我军。当时若不是党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就很可能被敌人冲乱打垮，整个广州亦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广州局势稳定之后，革命政府（大元帅府）于7月初正式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兼任主席，委员有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朱培德、许崇智、谭延闿、蒋介石等。8月，国民政府为统一军政，将所有在广州的忠于革命政权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编制顺序是：党军第1师（削平杨、刘之乱后由党军第1旅扩编而成）再度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建国湘军为第2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为第3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为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军为第5军，李福林任军长；程潜所部援鄂军和吴铁成部一个师合编为第6军，程潜任军长。以后李宗仁将军率军由广西来粤，所部桂军被编为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

军队改编之后，各军中均设有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使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得到加强，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革命政府军令不行的状况。

8月初，我奉命调任第1军第1师第4团第1营党代表。离开原部队前，营长金佛庄特地请我到广州一家餐馆

吃了顿饭，算是为我饯行。我与他共事虽不到半年，彼此关系却颇融洽。他年长我六岁，其政治、军事方面的经验和阅历十分丰富，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好同志。我走后不久，他亦调升为第1军第1师第2团党代表。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北伐战争时，他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途中，于南京下关被孙传芳部逮捕，旋被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四、回乡省亲及归队

1925年8月中旬，我趁广州局势平静、部队正在整训的机会，向上级请假回乡省亲，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我搭乘一艘苏俄的轮船先去上海，准备再从那里经武汉回长沙。当时，上海和湘、鄂两省均在军阀统治下，为避免暴露身份，我和同行的几位伙伴都着便装，亦未携带武器。

这艘苏俄船十分考究，我们又都住在头等舱，所以相当舒适。轮船在大海上行驶了几天。那几日海面上风平浪静，气候非常好。每天凌晨，我们都特意早早起床，站在甲板上，迎着习习的海风，观赏红日从大海上冉冉升起时的瑰丽景色，心情十分欢悦。

船到上海后，我思家心切，未多停留即独自换乘船去汉口，再由武昌乘火车去长沙。这时湘、鄂两省的社会秩序很乱，城市里乞丐、扒手成群，在由武昌去长沙的火车上，有个扒手竟趁我熟睡，将我放在坐位下的皮鞋偷走了。幸亏随身携带的行李未被扒手“光顾”，否则就让我窘迫极了。

到了长沙，我准备先去堂侄郑康侯家落落脚，设法会会我的兄长郑潼国后再回石门家乡。康侯那时正弃官闲居

在长沙城里。说来真巧，我一到康候家便和兄长不期而遇，原来他也辞了事情在康候家中小住。兄弟久别重逢，高兴的心情自不待言，他和康候一家人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这样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听兄长说，我去后杳无音讯（我在广州没有与湖南家乡通信），家人焦虑万分，老父亲还为此将兄长痛责了一顿，我的妻子也在家中经常哭泣。以后兄长多次托人在广州打探我的下落，均无消息，尚以为我不是死在兵荒马乱之中，便是随军队开往他处，终日为我担忧，现在总算把我盼了回来。

我在康候家住了三四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兄长、大哥（康候的父亲）、康候三人谈论时局问题。他们对广东的情形特别感兴趣，也颇有好感。我乃将自己在广州一年多的见闻经历及我所了解的革命政权的各方面情况都一一作了介绍，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谈话中，我也了解到北洋军阀在湘、鄂等省的统治极度腐败，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目前这种政治黑暗、战乱频繁的社会状况深恶痛绝。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我的兄长和堂侄，又苦于找不到出路，心情十分苦闷，所以他们不到40岁的年纪，便都弃官赋闲了。我这次回长沙，给了他们不小的震动，他们开始从广东国民政府方面，看到国家未来的希望。

数日后，我告辞兄长和康候一家人，动身返石门。由于交通不便，在路上耽搁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回到家中。家人见我平安归来，真是欢天喜地。连往日待子女一向威严的老父亲，也颤巍巍地抚着我的臂膀，口中喃喃地唤着我的乳名，仿佛怕有人再夺走他的儿子。这时我已有一儿一

女，两年未见，均长大了许多。他们怯生生地躲在妻子身后，不肯上前。想到自己当初不辞而别，去投奔广州，把生活的重担和抚育儿女的责任统统推在妻子肩上，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歉疚之感。望着妻子含泪的双眼，竟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

我探家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全村，乡邻们扶老携幼，一批批地赶来看望我，还有些儿时的伙伴，也特意来要求我带他们到广东去投军。父亲见我做了革命军军官，受到乡亲们如此尊敬，脸上也甚觉光彩，乃吩咐家人摆酒与众乡邻欢饮。

转眼过了中秋，我接到兄长由长沙托人捎来的一封急信。信中说，他从报纸上得知广东国民政府已再次兴师东征，讨伐陈炯明，目前两军正在激战中云云。闻此消息，我一刻也不能在家中呆下去了，次日便辞别父亲、妻儿，心急如焚地踏上回广州的归程。这次随我同行的，还有覃正格、覃道敦等四位青年，后来他们分别考入黄埔军校第四、五期。

我们在路上走了半个多月，一到广州，便听到一个惊人的噩耗，我们敬爱的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于8月20日被暗藏在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刺杀了！我绝对没有想到竟有人对功高德隆、深孚众望的仲恺先生下如此毒手，心中悲愤不已，几日不思茶饭。

这时，我原所在部队已随大军开上前线，为了能尽快赶上部队，我大胆地去求见接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汪氏很快就接见了我，而且态度非常客气。

我向他报到之后，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上前线的请求。汪氏说，我在原部队的职务已由别人顶替，他希望我能留在广州任黄埔军校医院党代表。但我执意要上前线作战，不愿留在后方。汪氏见我态度坚决，想了想方说：“你若一定要上前线也可以，不过要先在广州等一等，待我们的军队占领潮汕地区后，再自行设法前去寻找部队。若还愿意留在广州工作，可以随时再来找我。”我见汪氏极忙，不断有人来请示事情，只好起身告退了。

此后，我在广州足足焦急地等待了两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找到去前线的机会。这期间，东征军队于10月中旬经猛烈战斗攻克军事重镇惠州，随即又迅速占领了蓝塘、紫金、河源、老隆及海陆丰等广大地区。到了10月底，东征军与敌悍将林虎部在华阳一带再度激战，终将其精锐部队全部击溃。随着前线的捷报一个又一个地传到广州，我急得终日坐卧不安，心里开始后悔当初真不该请假探亲，以至失掉了这次出征机会。

11月上旬，各路东征军队陆续向潮梅地区集中，我闻讯非常高兴，千方百计地搭乘到一艘火轮前往汕头。在船上，我巧遇上军校一期同学蒋先云，彼此十分高兴。蒋先云的消息很灵通，从他口中我了解到一些有关第二次东征的详细情况。他特别向我介绍了我军强攻惠州之役的艰难情形和第2师4团团长刘尧宸等同志在攻城战中英勇牺牲的经过，我们既为革命军队所具有的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所鼓舞，也为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同志和战友而痛惜。蒋先云同志曾用深沉的语气对我说：“国民革命的成功，需要

用无数革命志士的生命去换取，为主义献身是光荣的。”两年以后，蒋先云也在北伐战争中英勇捐躯了，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现了他的诺言。

当时与我们同船前往汕头的，还有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1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的夫人邓颖超女士，但当时我还不认识她，故未见面。

船一到汕头靠岸，我即去找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东征军司令部当时设在汕头）。总政治部设在城内一所宽敞的院落里，我跨进恩来同志的办公室时，他正伏在桌子上向几位干部布置工作。我未敢惊动他，便悄悄肃立在门旁等待。过了一会儿，他交代完工作，抬头望见我，脸上立刻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哦，是郑洞国，你回来了？”言毕，伸出双手，绕过桌子快步向我走来。我忙不迭地向他立正、敬礼。恩来同志紧紧握住我的双手，热情地问道：“路上辛苦了吧？欢迎你归队！”我有些歉疚地说：“周主任，我回来晚了，仗都打完了。”恩来同志爽朗地笑道：“不，不晚，我们这里的工作多得很呐，正需要人手，你回来得还是时候。”我马上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分配工作的请求。恩来同志同身后的几位干部商议了一下，方转过身对我说：“潮州野战医院党代表的职位现在空着，你就去接任这项工作罢。”我听了这话心里凉了半截，心想我就是因不愿在医院里工作才从广州跑到前线来，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如留在广州了。恩来同志大约看出我不很情愿的样子，笑着补充说：“医院的工作也很重要嘛，你先去工作一个时期，以后我再设法替换你。”我不好再讨价还价，便将任务接受下

来，辞别了恩来同志，赶往潮州赴任去了。

谁知到了潮州野战医院，我才发现这里的情况很糟糕。首先是医院里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连手纸、肥皂都没有，再加上医院院长不负责任，使医院里的秩序乱七八糟，伤病官兵们牢骚满腹，几乎天天闹事。

我到任不到一星期，正碰上蒋介石先生到医院来视察，伤病员们乃纷纷向他诉苦、告状。蒋氏听了勃然大怒，马上把医院院长唤来，劈面就打了他几记耳光，又把他臭骂了一顿，当场将他撤了差。当时我也在场，见状心中颇为不安。但蒋氏知道我是黄埔学生，又刚到任不久，故对我非但没有责备，反而勉励了一番，并要我负责起医院今后的全部领导工作。我这才放下心来。

蒋介石先生走后，我立即着手整顿医院工作秩序，安抚伤病员；同时加紧向上级请求增加医药、食品和其它物资供应。不久，医院里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开始有了很大改善，伤病员们由于得到较好的照料，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以后再也无人闹事了。那时在医院中治疗的伤病军官们，许多是黄埔军校各期的同学，一来与我有同学之谊，二来见我肯为大家办事，故而都很支持我的工作，有事亦愿找我商量，这也是我的工作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

很快就到了旧历春节。刚刚摆脱了军阀蹂躏和战乱之苦的潮汕地区的老百姓欢天喜地，共庆新春佳节，一连好多天，潮州城内人山人海，到处是踩高跷、舞狮子、耍龙灯的队伍，一片太平繁荣景象。更感人的是，当地许多民众，手捧对联，担着猪羊酒菜，敲锣打鼓、络绎不绝地前

来劳军，与革命军官兵共同联欢，军民间真似鱼水一般。这是大革命时期我在广东渡过的最热闹的一个春节。

这时，广东全省已基本平定，国民革命军在消灭军阀陈炯明势力的同时，还分兵击溃了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部，从而完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精诚合作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迅速走向高潮。

1926年春，在潮州野战医院治疗的伤病员们陆续痊愈归队了，医院里的事情不多，我盼望着早些回到作战部队，也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于是又跑到汕头去见周恩来主任。恩来同志见到我就笑着问：“是不是在野战医院呆不住了？听说你在那里工作得还不错嘛！”我见他知道我的来意，索性就把自己的想法照直说了。我这次来得很是时候，当时部队都在整训、扩编，军事干部很缺乏，所以恩来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叫我先回潮州等待消息。不久，他亲自向蒋介石先生举荐，任命我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第8团第1营营长。我将在潮州的工作交代完毕，便高高兴兴地去部队赴任了。

第3师当时驻扎在海澄，后移驻梅县一带整训。这支部队是由原粤军第7旅许济部改编的，战斗力不甚强，官兵没有受过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也较差，在第二次东征战役中，该部曾在华阳地区被林虎部击溃，差点让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先生也遭受不测。在这次整编期间，上级抽调了一大批军事和政治工作骨干充实这支部队，并加强对部队官兵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特别是我们第8团团长徐庭

瑤很会带兵，不仅对训练抓得认真，而且有一套办法，使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面貌。以后，第3师在北伐战争中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劲旅。

令人遗憾的是，正在革命形势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国共两党间却出现公开的裂痕。1926年3月20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国民党右派借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擅自将中山舰开入黄埔，企图劫持蒋介石先生搞暴动，公然将李之龙扣押了，随后，强迫国民革命军第1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国民党右派在幕后一手操纵的，目的是制造事端，借机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因此也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关系破裂的第一个讯号。大约两个月以后，右派势力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排挤在军队和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共产党员。此后，国共合作的局面虽然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两党间的矛盾和裂痕却是日益加深了。

那时我们远离广州，对上述事情的真象并不清楚，只是感觉到国共两党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些麻烦。直到“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和一大批共产党员同志被迫退出第1军时，我们许多人才有所震惊，因为在军队中驱赶共产党人，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事实上，自第一次东征战役以来，国共两党同志在军队中并肩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周恩来同志，更是赢得了军队中两党同志的广泛敬仰，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同志的被迫离去，使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深为依恋和痛惜。

在那以后，我也曾暗暗地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前途担忧，但却绝未想到，仅仅在一年之后，国民党右派就向共产党人举起血腥的屠刀，由此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完全破裂。

五、北伐战争

1925年到1926年春，广东国民政府先后削平了广东省和广东革命政权内部的各个军阀势力，并实现了两广的统一，革命根据地日臻巩固。但此时，继北京政变后，先后取代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集团，掌握了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反动势力，对外向帝国主义列强屈辱妥协，对内破坏国民会议运动，残酷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吴佩孚、张作霖军队还联合向冯玉祥部国民军进攻，迫其退往西北。这样，中国的大多数省份仍处于北洋军阀和其它军阀势力的控制之下。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广东国民政府迅速出师北伐，以结束自民国创立以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军阀割据局面。因此，兴师北伐，用革命战争推翻列强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完成国民革命，已成为广东国民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出师北伐案。7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伟大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蒋介石先生为总司令，李济深将军为总参谋长，邓演达将军为总政治部主任。以下第1军至第8军的军长分别是：何应钦、

谭延闿（由副军长鲁涤平代）、朱培德、李济深（兼）、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共产党人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等亦分任第2、3、4、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当时，除第8军唐生智部和第4军叶挺独立团先已在湖南同直系军阀吴佩孚军队作战外，其余北伐军队先后分西、中、东三路出师北伐（第4军、第5军各一部留守广州，第7军一部留守广西）。

北伐军所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占据两湖、河南各省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军队，兵力约二十万人；盘踞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五省联军孙传芳部，兵力亦有二十万人，以东北为基地并据有山东、热河、察哈尔和直隶大部的奉系张作霖军队，兵力在三十五万人以上。敌人在军队数量上大大超过北伐军，且占有中国广大区域。但是，北洋军阀的残暴、腐朽统治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失尽人心。同时，三大派系军阀势力之间勾心斗角，称雄割据，互不相谋，无法协同作战，这些均为北伐军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北伐战争初期的主要战场在两湖地区。两湖地处由广东向北发展革命势力的要冲，而统治该地区的直系吴佩孚军队又是各派军阀中最凶恶的一支反动力量。故北伐军以主力西路军（包括第4军、第7军、第1军2师，以及原在湖南作战的第8军和第4军叶挺独立团共五万人）首先指向两湖战场。为了防止敌人从侧背袭击我军，威胁我后方根据地，北伐军另以两支军队分别警戒江西、福建的敌人，准备在两湖战场打垮吴佩孚部主力后，再集中兵力进

攻东南各省，击败孙传芳军队，最后进兵长江以北地区，消灭奉系张作霖军队。

7月上旬，西路军接连攻占株州、醴陵等城，湖南各地民众纷纷起而响应，欢迎和支援北伐军。由于广大将士英勇善战，再加上各界民众的支持，战争形势发展很快，西路军一路势如破竹，7月11日即进占湖南省会长沙。8月，西路军攻入湖北，在鄂南之汀泗桥、贺胜桥两役中，将吴佩孚在两湖地区的主力完全击溃，随即乘胜追击，兵临武汉三镇，相继占领汉口、汉阳，吴佩孚本人仓皇逃往郑州。10月，敌重兵固守的武昌亦为我军攻克。至此，北伐军实现了消灭吴佩孚部主力、首先在两湖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略目的。

北伐战争开始后，军阀孙传芳先是坐视观望，企图待吴佩孚部和北伐军两败俱伤时，再收取渔人之利。1926年8、9月间，孙氏见北伐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乃慌忙调集重兵入江西，准备向北伐军发动进攻。北伐军先发制人，于9月上旬乘孙部尚未集结完毕，派遣北伐中路军（包括第2军、第3军、第6军、第1军教导师及第5军一部）攻入江西，很快占领江西二十余县和赣南重镇赣州。9月中旬，第6军程潜部曾一度攻入省会南昌，但不久即被迫退出。稍后，第1军教导师亦在南昌城下遭到严重挫折。北伐军总司令部急调第7军李宗仁部、第4军李济深部先后入赣，各军协力猛攻，终于在11月上旬攻克九江、南昌，歼灭了孙传芳部主力。孙氏犹如丧家之犬，惊慌失措地登上兵舰逃回南京。北伐军军威大振，浩浩荡荡地顺长江东

下，由安庆、芜湖直捣南京。

从1926年7月至9月，第1军主力之第3师、第14师一直奉命驻于广东梅县、潮州等地，一面就地整训，一面警戒福建方面的敌人。大约在9月下旬，孙传芳因江西吃紧，遂命其第4方面军司令兼福建督办周荫人，集结大批军队准备进攻广东，意在牵制北伐军后方。根据对敌情的判断，我军料定敌人很可能是经位于闽粤交界的永定，向西进犯梅县之松口、三河一带。为此，我军巧妙用兵，仅留第3师第9团防守松口、三河一线，主力（第3师第7、8团、第14师和一个独立团）则在总指挥何应钦率领下，迅速向福建境内的敌人必经之地永定出击。这支部队就是后来的北伐军东路军（当时新反正过来的曹万顺部一个师驻于福建上杭一带，亦属东路军建制）。

东路军的作战意图是：先切断周荫人部主力的退路，与驻守松口、三河的部队前后夹击，将敌人聚歼于闽、粤两省交界地区；然后进攻闽、浙两省，牵制并歼灭孙传芳驻闽、浙一带的军队，以配合我军在鄂、赣战场方面的作战，最后与北伐军主力会师于上海、南京。

作战命令下达后，东路军即分左右两个纵队，分别由三河、潮州等地经大埔星夜向福建挺进。我所在的第3师主力在右路。

部队进入闽境后，我第1营即担任右纵队前卫。数日后的一个下午，部队接近永定县城。我原想指挥部队乘虚袭占该城，但前卫连刚一进至城东高地附近，即与敌人接触，顿时枪声大作。从敌人的火力判断，城内似驻有敌人

的大部队。我急命各连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并搜索敌情；同时派人向团部报告情况。不多久，团部就下达了指示，要我营加强戒备，原地待命。稍后，我们才知道刚才是同周荫人的警卫部队遭遇了。原来，敌人已在永定城内驻有重兵，周荫人的指挥部亦设在城内。同时据我方谍报人员报告，开入广东境内的一部分敌人，正在松口一带与我第9团激战；

战场上的这种情形均出乎敌我双方的预料。敌人方面绝未料到我军主力部队会突然出现在永定城下，一时惊慌失措，被迫仓促应战；我军亦未料到敌人会在永定城驻有重兵，周荫人亲自在此坐镇指挥。倘不迅速攻克该城，歼灭面前这股敌人，我军非但不能完成断敌退路的任务，还将使敌人乘虚深入广东，给我北伐后方根据地造成严重威胁。

为此，东路军指挥部果断地决定于次日拂晓实施攻城，限期破城，并将主攻任务交给了我们第3师第8团。

当晚，徐团长亲自带着我们几个营长和团部作战参谋，借着细微的月光，悄悄地观察了永定城周围的地形。永定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城，城东南方向的山势尤为险峻，且距城较近。山脚下有条小河由南向东北方向缓缓流过，过了河再有百十米距离便是城墙，其间参差座落着一些民房。敌人已抢先在城东的几个重要制高点上构筑了防御工事，不时向我方阵地鸣放冷枪，白天的战斗也是在这里发生的。永定城南则是一片较平坦的开阔地，距山地远些，敌人在那里也修筑了工事，驻有重兵防守。城西北方向山势相对

平缓些，是敌人的后方通道。

回到团部，众人均认为我军应先攻占城东一带险要高地，再以火力俯击城内，敌人势必难以久持。徐团长亦觉的这个想法甚好，当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做了战斗部署：第1营（配属团机枪连）担任主攻，任务是攻取城东各高地，第2营由城南佯攻，牵制敌人；第3营为团预备队。

翌日，晨曦微露，我指挥部队迅速运动至城东南各指定的攻击地带。敌人马上发觉了，惊慌地向山下发射密集的枪弹。但由于尚未天明，敌人搞不清楚我们的准确位置，只是打枪壮胆，未给我军造成任何伤亡。我刚把营部设置在距敌城东阵地不远的一个小高地上，即闻城南方向枪声骤烈，表明第2营已打响了。趁敌人注意力稍稍转移，我命第1连发起正面攻击，另遣第3连从右翼迂回而上，实施侧击。第2连及团属机枪连作为营预备队布置在营部附近高地上，用火力的掩护第1连进攻。

城东高地的争夺战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亦知此处为拱卫永定城的屏障，故拚命死守，与我军争夺甚为凶猛。

敌人据险而守，先占地势之利，居高临下，不断以密集火力压制我军进攻，使第1连的几次冲击均未奏效，并造成了一些伤亡。糟糕的是，担任迂回的第3连在中途亦为敌人发觉，被敌人的火力“卡”在山腰上动弹不得。双方遂以火力对射，形成僵持状态。

这时天已大亮，徐团长不时派人前来催问战果。我心中亦十分焦虑，因为部队多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倘这般胶着下去，势必徒增伤亡。经过片刻冷静地思考，我决定重

新调整火力，重点压制敌人的几个主要火力点，遂集中机枪连和迫击炮火力，猛击敌正面的两三个火力点。并挑选十余名优秀射手专以冷枪消灭其他敌人零散火力点。待敌火力稍减后，即令正面的第1连和右翼第3连加强协作，再次发动强攻。

正激战间，我的好友、第3营营长李及兰率队增援了上来。他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问：“郑营长，团长命我上来支援你，现在情况怎样？”我见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心中大喜，高兴地说：“你来得正是时候，这番定可破城了！”言毕，下令作为预备队的第2连也投入正面攻击。第3营官兵亦纷纷占领阵地向敌阵地射击。

我拉着李及兰隐蔽在营指挥所前三四十米处的一块巨石边指挥战斗。对面敌人的枪弹飞蝗般地打来，碎石、泥上溅了我们一脸，我们谁都不顾。

这一带的山势虽不太高，却很陡峭，站在山下仰头观察山顶都比较困难。所幸我营多是湘、浙、粤籍官兵，惯于山地作战。只见我攻击部队在强大火力支援下，以班排为单位，借山石树木为掩护，敏捷地向上攀登，与敌在山顶附近激烈厮杀，彼此均有伤亡。

正当敌我混战之际，右翼我第3连迂回成功，百余名官兵像旋风般地从斜侧里插入敌主阵地，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经几分钟拼搏后，敌人招架不住了，丢弃下遍地尸首和伤兵，乱哄哄地向后逃窜。我见状大喜过望，急将机枪连阵地移至新控制的制高点，向敌城垣工事猛烈扫射，同时命第1营主力加紧向城垣进逼。另以一部沿城东南山坳，

跑步涉过小河，直扑敌之东门。

敌人见城东屏障已失，头顶弹如雨下，军心动摇，再也无法抵挡我军的凌厉进攻。我军刚刚进迫至城垣，城内守敌便纷纷由北门向外逃窜，我军未经激烈战斗即突入城内。正在南门外与我第2营对峙的敌人，见城内失守，阵脚大乱，在我军冲击下落荒而逃。我军完全控制了永定城，时间刚好是正午。

是役，除敌将周荫人率少数亲随夺路逃窜外，守军大部被我军消灭了。追击途中，我营缴获到一件漂亮的大衣，士兵送到我面前时，衣内尚有余温。后经俘虏指认，方知此衣为周荫人本人之物，在逃窜时失落。由此可见周荫人逃命时的狼狈之状。

我第1营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色，斩获甚众，仅俘虏就抓到四五百名，受到上级嘉奖，全营官兵，一片喜气洋洋。这是我经历的北伐出征以来的第一次战斗洗礼。

永定战斗结束后，东路军除由何应钦将军率独立团留驻该城担负警戒外，主力未及休整，即在前敌总指挥兼第14师师长洪兆麟将军指挥下火速回师广东松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进犯该线之敌。

我军日夜兼程向松口疾进，赶至松口附近时，正是拂晓。担任我师前卫的第3营一翻越松口镇以北附近的高地，便在镇边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打响了。该营营长李及兰指挥部队迎头痛击敌人。一个猛冲便把敌人打得缩回镇内。敌人不甘示弱，马上派出大批兵力反扑过来，接着我团第2营也奉命加入了战斗，双方在这片不太大的开阔地上展开了

一场恶战。

此时，我师第7团和第14师正在向松口方向前进中，尚未与敌接触。我透过硝烟，发现敌人正慢慢地向我军两翼压迫，遂不断目示身边的徐团长，意在请求出击。徐团长镇静自若，手持望远镜专注地观察敌情，似未察觉我的急切表示。

大约四十分钟后，镇东方向突然响起剧烈的枪炮声，而且愈来愈近。不久，一传令兵飞跑来报告，说第14师和我师第7团已在左翼和敌人打响了。同时，沿梅江南岸据守的我师第9团也向敌人发起了攻击。这个消息使我们大为振奋，徐团长果断地一挥手，命我营投入正面攻击。伏在高地上观战多时的第1营官兵早已按捺不住了，攻击令刚一下达，各连就迅猛地 toward 敌人扑去。

敌人因东、南、北三面受敌，被迫分兵应战，也只有招架之功了。我营加入战斗后，在镇北方向苦战的第2、3营士气益振，协力向敌人猛攻，打得敌人步步后退。又经两三个小时的鏖战，敌人终于全线崩溃，四散逃命。我团首先冲入镇内，会合友军后即展开追击，将逃敌大部消灭在镇外，只有少数跑得快的敌人才侥幸逃脱。黄昏前，战斗全部结束。

松口一役打得更漂亮，我军不仅彻底解除了敌人对广东根据地的威胁，而且将周荫人的大部主力消灭掉了，为后来东路军顺利进军闽、浙，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1营在松口战斗中又建战功，俘获敌人的人枪逾千，列全团榜首，再次受到上级嘉奖。

我军收复松口后，就地休整了一个星期。这个小镇经过周荫人部队的蹂躏，已经十室九空，破败不堪。我的营部驻在镇边一所小学校内，校园中到处是敌军士兵遗下的便溺，臭气薰天，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清扫干净。说也奇怪，学校图书室里的许多书籍居然保存得完好无损，使我大为高兴，每日除了处理军务，便埋头读书。

10月中旬，东路军主力由松口出发，再次进入福建。在永定，我们与留驻这里的独立团会合，又休整了十余日。11月初旬，部队继续开拔，浩浩荡荡地向位于永定东南二百余华里外的重镇漳州挺进。

在向漳州进发的途中，我出了一次“洋相”。某日黄昏，我营刚刚在一个小村落里宿营，团部一名传令兵匆匆跑来交给我一张纸条。我打开一看，是徐团长的一张亲笔便条，上面仅寥寥一行字：“郑营长，晚上请到团部便餐，因有红烧牛肉故也。此致。徐庭瑶即日。”我急忙带上一名传令兵策马驰往团部。到了团部，发现除我之外，其他各营营长均未到，正诧异间，徐团长笑呵呵地迎上来，招呼我和几名团部军官入席，我坐定一看，满桌菜肴中果然有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徐团长先道：“今天没有公事，各位要开怀畅饮，郑营长更要多吃几杯。”说毕便与众人干起杯来。席间的气氛十分活跃，自北伐出征以来，东路军连战连捷，我们第8团亦屡建战功，大家的心情都格外畅快，再加上有些丰盛的酒菜，愈发助兴。我本来酒量不大，禁不住众人频频相劝，不觉吃得大醉，以至席是如何散的也不晓得了。夜里醒来，我才发现是睡在副团长的房间里，床上、地

下让我吐得一塌糊涂，真是狼狈之极。

第二天早饭后，徐团长将我唤去，郑重地通知我：奉上级指示，他将调升他职，由我接任第8团团长。这时，我方明白昨晚的酒席原来是为欢送徐团长和庆贺我升任团长预备的。从此，我这个还不满24岁的青年，就肩负起指挥一个团队的重任。

此时闽浙战场的形势对我军十分有利。孙传芳为支撑残局，被迫将大部分主力先后调入江西战场作战，闽、浙空虚。而留在福建的周荫人部队，经永定、松口两役后，已成惊弓之鸟，军心动摇，我军所经之地，敌人多望风出降。当我军进至漳州十余华里外时，敌漳州守军师长张毅便主动派人来接洽投降，东路军指挥部将受降任务交给了第8团。

次日上午，我团在驻地附近的一片开阔地上排开严整的队列，等待张部投降。不多久，张部便一个团一个团地陆续开来缴械。我们招待这些投降官兵吃了顿饭，然后召集他们讲话，凡愿留下者编入部队，不愿留下者则发放一些川资，将其遣散了。

占领漳州后，我军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向进军，一路未经大的战斗，于12月上旬进占福建省会福州，福建全省遂基本平定。

东路军占领福州之后，本应迅速进兵浙江，消灭孙传芳驻浙部队，积极配合北伐军主力在苏、皖、浙战场的作战。但不知何故，东路军在福州一停便是一个多月，后经总司令蒋介石一再电催，并派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将军亲率

几师精锐部队由赣东入浙作战，东路军方于1927年初离开福州，经古田、建瓯一直向浙江前进。

部队抵达建瓯时，有新归附的一师孙传芳军队驻于城中，因其内部不稳，指挥部决定将其缴械。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暗中将城内地形及敌人分布情况侦察清楚。第二天恰是除夕，我们乘其不备，夜间即以突然行动将该部全部包围缴械，几乎不耗一枪一弹。次日，我们将该师官兵一部遣散，一部编入各师，并利用缴获的大量物资过了春节。正月初三、初四，部队才陆续出发，经浦城、仙霞岭进入浙江境内。

这期间，白崇禧将军指挥的军队在浙西打了几场大仗，基本上消灭了孙传芳在浙江的主力，并积极向上海推进。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抓住时机，连续三次发动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胜利，控制了整个上海。此后，浙江境内的残敌已成土崩瓦解之势，一触即溃，故东路军再未经大战，一路进军顺利。

东路军自出征以来，很重视对官兵开展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搞得十分活跃，因此部队赖此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和严明的纪律。在进军浙江途中，正值早春，天气尚冷，官兵们都身着单衣，无法御寒。偏偏又赶上连日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不堪，行军非常困难，部队减员也很大。但全军将士上下一心，团结互助，硬是咬紧牙关克服重重困难。最令人难忘的是浙江地区的民众，沿途自发地组织起来，有的为部队挑土铺路；有的捧着茶水、食物，冒着雨雪候在路旁劳军；还有一些民众联合设立了许多收容站，热情地

收容、照护伤病员，使他们很快就陆续痊愈归队。这种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使部队官兵深受感动和鼓舞，由此也令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军队所肩负的责任。多年以后，我还常常回忆起北伐途中的这些动人情景，可惜在后来的国民党军队中，这种情景已是很难看到了。

是年3月，东路军经江山、衢州、龙游、兰溪、桐庐进占杭州。在风景秀丽的西湖湖畔休整了两天，部队又继续出发，经泗安、广德、溧阳、句容，一直向南京挺进，与由江南顺长江东下的北伐军主力形成钳形攻势。此时孙传芳的残兵败将已是魂惊魄散，纷纷望风而逃。东路军仅在南京东南的句容与奉军一部有过一次接触，很快即将敌人击溃，并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3月下旬，东路军终于兵临南京城下，与城内刚刚到达不久的第6军程潜部胜利会师了！

北伐军占领南京，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极度恐慌。东路军抵达南京城的当晚，云集在下关附近江面上的英、日、美、法军舰，借口其侨民受到伤害，突然向南京下关和栖霞山地区实施野蛮的炮击，打死打伤我军民二千余人，击毁民房无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当时，我率部据守栖霞山阵地，亲眼看到阵地附近和下关的市民居住区燃起熊熊大火，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下奔逃号泣，惨不忍睹。我军官兵无不义愤填膺，不待上级命令，便自动进入阵地向列强兵舰狠狠还击，双方激烈交火近一小时。可惜我军缺乏重武器，火炮尤少，未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通过这次事件，使我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是国民革命的凶恶敌人，不将这些列强势力驱逐出中国，则中国革命断无成功之望。

但是，使人万分痛心的是，就在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革命大业正待继续向前发展之际，革命阵营内部却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大资产阶级的威胁、利诱下发生了严重分裂。1927年4月12日，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在上海公开宣布“清共”，并以武力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消息传到南京，我们不少人都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尽管自1926年春以来，中共与国民党右派之间发生了诸如“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大大小小的矛盾，但许多人对于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还是坚信不移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在大革命洪流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军军人，在黄埔军校以及后来的东征、北伐战场上与共产党员同志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结下了血肉情谊。现在革命尚未成功，我们怎能同室操戈，自相残杀？！

正在我们许多人惊愕不定的时候，蒋介石偕胡汉民、吴稚晖等匆匆来到南京。他们一到就召集各部队讲话，言辞激烈地攻击共产党人和武汉国民政府（此时国民政府已由广州迁抵武汉）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事业，表示要对在南京的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同情武汉国民政府分子实行“非常紧急处置”措施（即清党），同时宣布要在南京另外成立国民政府。这下南京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我在军队中的许多朋友、熟人不久便陆续失踪了。后来方知他们当中有

的遭到逮捕，有的被杀害，有的则设法跑掉了。军队内部一时人心惶惶，谁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厄运临头。至于我们这些平时被认为思想左倾，与共产党人往来较密切的军官，都做好了被撤职或遭捕杀的准备。以后我本人虽然未遭杀头之祸，亦未被撤职，但却在军队中长时期得不到升迁。数年后，当时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负责人的一期同学黄雍告诉我，在该会秘密掌握的黑名单上，我早已被列为共产党嫌疑分子，经他发现后，始将我的名字从中抹去了。

1927年蒋介石于南京实行“清党”时期，我的思想是非常迷惘、苦闷的。那时我还是一个思想比较单纯、幼稚的青年军人，虽然有着朴素的爱国思想，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却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亦无清醒的、足够的体察，以至在这一突发的政治事变面前，全然失措，失去主张。继而又因政治思想上的糊涂和封建思想的束缚，终于走上了一条违背自己革命初衷的政治道路。当时我尽管对共产党人遭受的厄运充满同情，对蒋介石的“清共”之举不能理解，甚至反感，但在我心目中却始终认为蒋先生是已故孙总理的正统继承者，是我们当然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背叛他即是对“党国”不忠。因而几经痛苦的抉择，我还是决定跟着蒋先生走，一直到1948年秋长春和平解放，我才结束了这一长达二十余年的曲折历程。